



张大千在敦煌石窟中临摹壁画

一代书画大师张大千先生，不仅是中国绘画史上画荷花的佼佼者，而且也是中国当代描绘人物、仕女画的一代宗师。

张大千人物、仕女画，构思严谨、线条流畅、设色典雅。特别富有韵味的是他笔下的仕女图，脸形轮廓柔和秀朗，柳眉凤眼神态温良，纤手柔美细腻传神，衣裳飘逸流光溢彩。之所以张大千在人物、仕女画题材方面有如此大的成就，这固然与他在平时生活中细心观察、留心细节密不可分，但更重要的是在年轻时他受恩师启发，中年时远涉戈壁荒滩三载临摹敦煌壁画，汲取古人

张大千赴敦煌 临摹壁画追忆

□ 杨建国

绘画精髓，“借古开今”，方才使其人物、仕女画达到了惟妙惟肖、淋漓尽致的高层境界。张大千的绘画特色，在中国当代绘画史上占据了重要而突出的位置。

可以说，敦煌之行是张大千

人生艺术乐章中最具风采和最为激越的重要章节。对其人物、仕女绘画艺术的创新升华、独树一帜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但张大千先生敦煌之行的起因、过程、工作，以及其中之曲折、艰辛，却为世人所鲜知。由此，追忆往事，令人感动、感叹、感慨！

出行敦煌

张大千早期绘画，师从曾农髯、李瑞清两位艺术前辈，并从他们那里初晓敦煌艺术，得知那儿有难得一见的佛经和唐宋人物画像。那时他就有了强烈的

想法——有机会一定要到那儿拓宽眼界，见识一番。抗战初期，三十多岁的张大千迁居苏州网师园，与著名美术教育家叶恭绰为邻，结为忘年交。叶多次对张谈起敦煌，认为一个治学搞艺术的人，必须深刻了解中国的文化底蕴。他曾面色凝重地对张大千说：“从明朝至清朝，中国的人物画在衰退。人物画的鼎盛期是在唐朝，宋朝有李龙眠，元朝有赵子昂，明朝有唐寅、仇十洲等人，明末还出了一个陈老莲，而到清朝就后继乏人了。只要你有抱负到敦煌静下心来，用毅力刻苦地多汲取、多探究古代艺术家的绘画布局、色彩、技法，我相信你的才艺必无可限量，终有超越古人的那一天！”

张大千闻后，深受鞭策。应当说，曾、李、叶这三位艺术前辈的谆谆教诲，对张大千下定决心去敦煌临摹、传承壁画艺术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。

1941年元月，国民党元老、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张群（早年与张大千结下书画缘，情同手足），对张大千敦煌之行十分关心，命

其老部下国民党第八战区东陆总指挥鲁大昌将军、兰州市长蔡孟坚，对此给予大力支持与帮助。同年2月初，张大千一行从成都飞到兰州。自兰州进入永登县就是马家军的防区了，沿途常有土匪强盗出没。再往西行，进入沙漠地带，只能骑马或骆驼，风餐露宿，行程十分危险，生活异常艰苦。到了永登县，“由鲁大昌先生致电马步青旅长，说明我要去敦煌的目的。敦煌附近，常有哈萨克流寇出没，请求马旅长保护。马旅长回电欢迎我去，并派兵一连护送我入敦煌。”（张大千《我与敦煌》）

当车马劳顿、满脸疲惫、胡子邋遢、身穿驼毛大袍的张大千，出现在前来迎接的马步青旅长面前时，马步青不禁乐了，当众戏

称张大千就像他老家合州东乡卖鸡蛋的老农！瞅着马步青傲慢无理的神态，张大千强压心中不悦，一声不吭地随即取出笔墨、纸张，当即写诗一首：“野服裁成驼褐新，阔袍大袖成闲身；无端更被将军笑，唤作东乡卖蛋人。”马接过一看，立刻肃然起敬，惭愧地向张大千拱手道歉，希望海涵。此行沿途尽管有小股土匪骚扰，但在马家军的竭力帮助和保护下，张大千一行顺利到达敦煌。

面壁摹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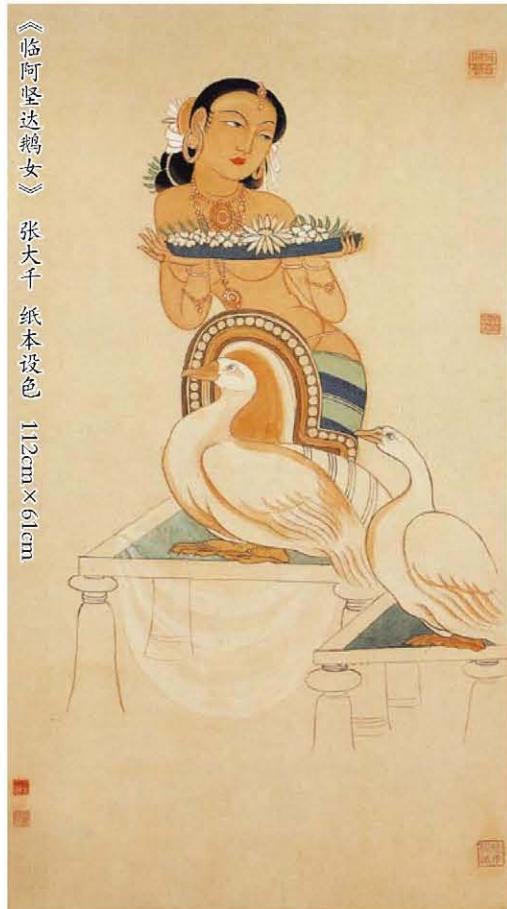
敦煌石窟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。它实际上是敦煌一带石窟的总称，包括莫高窟、西千佛洞、东千佛洞、安西榆林窟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五个庙的石窟等。其中，莫高窟为敦煌的艺术中心，

其开凿于公元366年，历经北魏、西魏、北周、隋、唐、五代十国、宋、西夏、元各朝代。它拥有一千多尊窟龕，内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492个，其间彩塑有2455身，壁画有45000多平方米，尚有唐、宋所建木构窟檐5座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，集壁画、雕塑、建筑等为一体的艺术宝窟。敦煌壁画艺术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约一千年。窟中壁画，从天花板一直延伸至墙角，从北魏一直到元朝，各代画法嬗变清晰可辨，人物绘制工笔精细，衣饰华贵色彩艳丽，神态高雅风华绝代，它代表了中国佛教文化艺术的最顶峰。

进入敦煌莫高窟，张大千被呈现在眼前美轮美奂、绮丽璀璨的壁画艺术震撼了，他不禁深深地感叹道：“古人云：‘一出嘉峪关，两眼泪不干；前看戈壁滩，后望鬼门关。’先辈们在这人类难以生存的大漠荒滩，修建了如此宏伟壮观的建筑，绘制出如此规模浩瀚的壁画艺术瑰宝以及佛教雕塑艺术，真是世界奇迹！”他暗下决心，在此大干一场，传承中华绘画之精髓，弘扬华夏文化之光辉。

艰苦卓绝的临摹工作开始了。为避免损坏这些壁画表面，首先由两个学生站在架子上，悬空提纸，由张大千勾描；然后，将勾描好的图案，拓展到画布上；最后，再对着壁画，看一笔，画一笔。操作程序异常繁琐，工作量非常大，任务十分艰巨。

在极为恶劣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下，对已过不惑之年



《临阿达迦女》 张大千 纸本设色 112cm×61cm



《杨妃调鹤》 张大千 纸本设色 161cm×64cm

的张大千来说，其工作强度和精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。但他与大家同舟共济、同甘共苦、无怨无悔。潇洒乐观的张大千，很会苦中作乐。他是戏迷，酷爱京剧，便带了梅兰芳、程砚秋、马连良、孟小冬等不少京剧名角的唱片。他把留声机搬到洞内，放唱片给大家听，以缓解疲乏，增添乐趣。戈壁荒漠，缺少蔬菜，整天羊肉、牛肉吃得大家都腻了，不仅上火，而且便秘。为给大家的盘中增添“绿色食品”，张大千空闲时常利用散步搜寻野菜、野蘑菇。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。后来，居然被他找到了一种能食用的野蘑菇，烹煮炒炸，味道极佳，给单调乏味的食谱中增加了一道“美味佳肴”，其乐无穷。

蒙受冤屈

张大千到敦煌后，深感这座被埋在大漠之中的世界著名艺术宝窟，因缺乏保护已导致大量艺术瑰宝被盗、流失，大量壁画已因被风沙雨雪侵蚀而脱落，若不采取必要措施，加强保护、修缮的话，这座历经几千年，由历代王朝无数大师级的艺术前辈和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所独创的，并被国人引为神奇而自豪的艺术宝库，将会在不久的将来毁于一旦，也会让我们愧对子孙后代。

代成为千古罪人。于是，张大千在这里一面与弟子认真细致地临摹壁画，另一方面又抽空进行调查研究，详细搜集整理各洞窟的

其建言政府应及早建立敦煌艺术专门管理机构，并就保护、修缮、研究等方面提出了建议。为此，得到了于右任的大力赞赏和肯定。

在于右任等一批有识之士的奔走呼吁下，1943年2月，国民党政府在敦煌莫高窟驻地建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，全权负责敦煌宝窟的管理、保护、研究等工作，并委派教育部著名教育家常书鸿担任第一任所长。常书鸿到位后，就如何管理、修缮、研究敦煌艺术等诸多问题，虚心向张大千请教，并达成了共识。张大千离开敦煌时，将三年来调查研究的成果资料和设想，全都送给了常所长，为该所后来对敦煌宝窟的保护与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。

更可贵的是，后来因张大千在敦煌临摹、开发的壁画艺术展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，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：不仅感召了一大批被敦煌艺术所深深吸引的有志青年，投奔献身到敦煌艺术保护研究的工作中去，更使中国璀璨的敦煌艺术在全世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赞誉。尽管张大千的敦煌之行也遭到非议，背上

所谓“破坏壁画”的诬陷使其蒙冤。但他为传承、保护敦煌艺术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，可谓造福后代、功德无量。（未完待续）



原貌现状、缺损状况及急待解决的问题等第一手材料。1942年6月初，张大千趁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来敦煌视察时，向